

商务印书馆

主编 刘东

# 中國學術

第三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1 No. 3

中国图书馆

史海文珍

# 中 國 文 學 精 千

卷之三

中國文庫總編室編輯 1981年3月

# 中國學術

選書

第三輯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秋·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第3辑/刘东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ISBN 7-100-03134-6

I. 中… II. 刘… III. 社会科学 - 中国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177 号

封面题签 饶宗颐  
责任编辑 常绍民  
王希勇  
封面设计 李有良  
版式设计 毛尧泉

ZHONGGUÓ XUÉSHÙ

中 国 学 术

第三辑

主编 刘 东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134-6 / C·60

---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插页 1

印数 3 200 册

定价: 26.00 元

## 卷 首 语

挨到推出第三辑时，编辑工作已渐入佳境了。从评稿到审稿再到发稿，都大体有章可循。可不知怎的，少了当初乱糟糟的气氛，这种家常事倒不够刺激了，像大学的课程表一样古板。

那就来看看论文罢——毕竟好文章最能提神。对于该栏目的杂乱，我刚发表了几句搪塞，幸请读者明察：“《中国学术》永远都不追求论题和风格的划一，以致太过突出编者的主观色彩……真正堪称研究的文字，毕竟不允许外行随便客串，即使是相当优秀的作者，也只能各有各的定位，只能来贡献自己的看家本领。你或许可以对篇目稍作调整，让目录和内容显得连贯一些，但你绝不要去命题作文，除非那正是别人最拿手的强项。”

汪晖和包弼德两文，论域碰巧相近，且构成了相应的紧张。前者把天理的成立视为儒学道德判断方式的转变，并以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为轴心，探讨了这一转变在唐宋之际跟南北关系、土地制度、科举制度和其他社会变化的互动，从而试以宏大的叙事和超长的篇幅，部分激活诠释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向度。后者则借助士人身份的重新界定、“小国家”格局的逐渐形成、文化观转而基于心念等细部的解构，回顾了国外近来对唐宋转型的重新阐释，并将此转向总结为对历史目的论的拒绝，即不再循着“早期现代性”的误导，把“门阀衰落/平民兴起/商业发达/皇权独裁/佛道脱魅/儒学复兴”等因子，强行勾联成普遍主义的准西方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新因子并未被锁定为新模型，历史由此便敞开了可能；而一旦历史改书为小写，我们的文明便凸显为大写。

接下来的话题是上海。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的“客观线条”中，解析出了激烈的权力和价值之争，足见一张地图虽看似属实，终是文化观念与政治利益的产物。而有关城市未来定义的争斗，其结局却是城市整体战胜了特定群体：图中反映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正乃上海此后发展成现代大都会的基础。张旭东分析了中国的现代性观念在当代上海重构自身文化及历史时的寓言式表述：张爱玲四十年代对上海的描绘包含了对现代都市文明

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讽刺和颠覆，而九十年代上海怀旧的文化话语则是在市场化下对资产阶级“普遍秩序”的虚拟“回忆”和本土化努力；由此吊诡的是，怀旧中竟掺杂着怀新，王安忆的上海写作具有结构性隐晦，其忧郁看似源自对旧“黄金时代”的追忆，实则缘于新生活世界正被消费社会吞没。

张新颖也在研究文学，视角则专注于内在。作者从二三十年代选取三位不同类型的诗人——李金发、戴望舒和卞之琳，示例了中国新诗在借鉴西方和怀恋、歉疚中国古典之间的彷徨与探索，足见中国新诗在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识后，对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益发突出。

以下两篇亦各擅胜场。梁太济考出《圣政》一书的今本，不只是将两种原本汇合为一，还将原本“分门立论”的体例改成了编年纪事，并将分别以“臣等曰”“史臣曰”领起的论改冠以“臣留正等曰”；对于事条，则高宗朝几乎全据《系年要录》作了更换，孝宗朝亦据原所依据的《日历》重新节录。曹树基认定在明代人口增长率的研究中，从资料到方法，何炳棣多有失误。此文根据区域性人口资料的分析，指出明代中国北方的人口增速高于南方；而且从十二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一直存在北、南不同的人口发展类型。

在评论一栏，宇文所安建议悬置实际写作规则，考虑一些似不实用的文学史问题：我们各种先人的见解（如按朝代来断代文学）能否成立？我们的想象力可否为观照过往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证据？我们经由中介（如控制文本流传的经典化）所形成的观念是否纳入了晚出的理解？经此一问，文学史的知识或不再笃定，思力却应有所深化。王晴佳梳理了后殖民主义的缘起与影响，分析了它对历史学的冲击，还联系国内现状试探了可能的启迪。

书评栏仍得益于各主力大学的读书种子，他们以琳琅满目的奉献，首先勾起了我本人的馋虫，恨不得抛开繁杂的编务，钻进图书馆里再不问世事！通讯栏如今也正式开张，其特点首先是心平气和：无论呼应还是就教，毕竟是为了以文会友切磋学理。

最后要欢送蒋狄青先生赴美深造——谢谢他承担了以往的编务，也望他以前并非只在付出，因为我们的评稿例会，其智慧含量并不低于寻常的研讨班。

刘东  
二〇〇〇年五月一日于京郊溪翁庄

主 编：刘 东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万俊人(清华大学)       | 巴斯蒂(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 |
|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    | 王邦维(北京大学)      |
|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     | 瓦格纳(海德堡大学)     |
| 田浩(亚里桑那州立大学)    | 艾尔曼(普林斯顿大学)    |
| 刘东(北京大学)        | 刘禾(伯克利加州大学)    |
| 宇文所安(哈佛大学)      | 安乐哲(夏威夷大学)     |
| 张伯伟(南京大学)       | 李伯重(清华大学)      |
| 李明辉(台湾中央研究院)    | 李零(北京大学)       |
| 杜瑞乐(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 杜德桥(牛津大学)      |
|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      | 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    |
| 沟口雄三(大东文化大学)    | 陈平原(北京大学)      |
| 陈来(北京大学)        | 周锡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
| 孟悦(加州大学尔湾校区)    | 岸本美绪(东京大学)     |
| 松浦友久(早稻田大学)     | 姚大力(复旦大学)      |
| 胡志德(洛杉矶加州大学)    | 荣新江(北京大学)      |
| 贺萧(圣克鲁兹加州大学)    | 倪梁康(南京大学)      |
| 唐晓峰(北京大学)       | 秦晖(清华大学)       |
| 钱乘旦(南京大学)       | 高毅(北京大学)       |
|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    | 阎步克(北京大学)      |
| 葛兆光(清华大学)       | 滨下武志(东京大学)     |
| 德里克(杜克大学)       |                |

## 第三辑 目录

### 卷首语

### 论 文

汪 晖	天理之成立 .....	1
包弼德	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	63
叶凯蒂	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 .....	88
张旭东	现代性的寓言：王安忆与上海怀旧 .....	122
张新颖	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 .....	162
梁太济	《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 .....	182
曹树基	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 .....	205

### 评 论

宇文所安	瓠落的文学史 .....	237
王晴佳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 .....	255

### 书 评

泽林斯基：《美国文化地理》(唐晓峰)	.....	289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张伟然)	.....	293
刘桂生、林启彦、王宪明编：《严复思想新论》(鲁金山)	.....	299
米歇尔·霍克斯编：《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场》(戴沙迪)	.....	302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方向红)	.....	304
彭富春：《无之无化》(丁耘)	.....	309

布迪厄:《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王利).....	311
米歇尔·韦维卡:《种族主义导论》(张伦).....	313
保罗·汉密尔顿:《历史主义》(陈新).....	316
皮姆·登布尔:《作为一项职业的历史学》(顾杭).....	319
丹尼斯·德沃金:《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赵国新).....	321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	324
诺伯特·埃利亚斯:《符号理论》(熊浩).....	326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的意涵——构建 一个自治的社会》(刘海波).....	329
沃恩:《奥地利经济学在美国——传统的迁移》(蒋狄青).....	332
斯蒂格勒:《斯蒂格勒论文精粹》(柯荣住).....	334

## 通 讯

陈意新 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	337
---------------------------	-----

# Contents

## Preface

## Articles

Wang Hui, The Establishment of Tianli (Heavenly Principle) .....	1
Peter K. Bol, Reconsidering the Tang – Song Transitio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 Change .....	63
Catherine V. Yeh, The Debates of the Future Definitions of Cities: Seeing from the 19th Century Maps of Shanghai .....	88
Zhang Xudong, Shanghai Nostalgia: Modernity, Allegory, and Mourning in Wang Anyi's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 1990s .....	122
Zhang Xinying, The Modern Anxiety of Chinese New Poems about Its Own Problems .....	162
Liang Taiji, The Contemporary Version of <i>Sheng Zheng</i> is not in Its Original Form : a Detailed Demonstration .....	182
Cao Shuji, On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n the Ming Dynasty .....	205

## Reviews

Stephen Owen, A Useless Literary History .....	237
Q. Edward Wang, The Post – colonialism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	255

## Book Reviews

Wilbur Zelinsky, <i>The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i>
---

(Tang Xiaofeng) .....	289
Li Xiaojie, <i>The Geography of the Political Zones of the East Han Dynasty</i> (Zhang Weiran).....	293
Liu Guisheng, Lam Kai Yin, Wang Xianming ed., <i>New Perspectives on Yan Fu's Thought</i> (Lu Jinshan).....	299
Michel Hockx ed., <i>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 - Century China</i> (Alexander Des - Forges).....	302
Ni Liangkang, <i>A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i> (Fang Xianghong) .....	304
Peng Fuchung, <i>The Untransformed Transformation</i> (Ding Yun).....	309
Pierre Bourdieu, <i>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i> (Wang Li) .....	311
Michel Wieviorka, <i>An Introduction of Racialism</i> (Zhang Lun) .....	313
Paul Hamilton, <i>Historicism</i> (Chen Xin) .....	316
Pim Den Boer, <i>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 - 1914</i> (Gu Hang) .....	319
Dennis Dworkin, <i>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i> (Zhao Guoxin) .....	321
Ulrich Beck, <i>Risk Society</i> (He Bowen) .....	324
Nobert Elias, <i>The Symbol Theory</i> (Xiong Hao) .....	326
Vincent Ostrom, <i>The Meaning of American Federalism: Constituting a Self-Governing Society</i> (Liu Haibo).....	329
Karen I. Vaughn, <i>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i> (Jiang Diqing) .....	332
George J. Stigler, <i>The Essays of Stigler</i> , (Ke Rongzhu) .....	334
<b>Correspondence</b>	
Chen Yixin, Did Birth Regulation Slow Down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of Jiangnan in the History? .....	337

# 天理之成立

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一、宇宙论与北宋道学之成立

北宋道学及其对“天理”的确立是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它的基本姿态是破除二氏(佛教和道教)的迷误，废弃汉儒的传注之学，恢复儒学的真实面目。理学和心学的概念是在元末张九韶(张和美)《理学类编》、明代陈真晟《心学图》之后才开始流行，在此之前多称道学，例如元修宋史仍称“道学传”。<sup>1</sup>有些学者试图摆脱理学与心学的习惯划分，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分类法，这里不作评论。<sup>2</sup>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儒学研究一直遵循了宋明理学家的自我理解，侧重从理学与佛老二氏以及汉学的关系中探讨理学的起源，

1 关于宋明儒学究竟称之为道学还是理学是有争议的问题。在〈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一文中，冯友兰根据程颐、朱熹以及其它史书的资料，认为既然道学概念运用在前，则就应该运用道学概念，而不是理学概念。理学概念只是在与心学概念对举时，才可运用，而它们都可以纳入道学的范畴。见《论宋明理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52页。

2 例如，牟宗三的观点是：“宋明儒之发展当分为三系：(一)五峰蕺山系：此承由濂溪、横渠而至明道之圆教模型(一本义)而开出。此系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以《论》、《孟》为主。特提出‘以心著性’义以明心性所以为一之实以及一本圆教所以为圆之实。于工夫则重‘逆觉体证’。(二)象山阳明系：此系不顺‘由《中庸》、《易传》回归于《论》、《孟》之路走，而是以《论》、《孟》、摄《易》、《庸》而以《论》、《孟》为主者。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现，一心之伸展，一心之遍润；于工夫，亦是以‘逆觉体证’为主者。(三)伊川、朱子系：此系是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于《中庸》、《易传》所讲之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炼而为一本体论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于孔子之仁亦只视为理，于孟子之本心则转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因此，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涵养须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进学则在致知’)，总之是‘心静理明’，工夫的落实处全在格物致知，此大体是‘顺取之路’。”《心体与性体》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2—43页。

而较少关注理学兴起的制度背景。

宋明理学内部长期存在着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等命题的论争，这些论战不但引起了人们对于天理概念的反复解释，而且也促成了理学类型的转变（如理学与心学）。宋明理学内部关于如何界定天理的讨论既涉及这一范畴的含义转变，也标志着儒学的理论重心的变化。这些转变相应地改变了人、世界和宇宙万物在天理世界中的位置，最终促成了天理自身的地位危机。天理概念把宇宙论、本性论、心性论以及修身论融为一体，如果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理学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它认为道德的最终根据在于一个既内在又超越的天理，而不是仅仅按照现实制度的标准进行道德评价。这并不是说现实制度不再扮演道德评价的客观基础，而是说在理学的视野内，只有体现了天理的现实制度才能提供这一基础。因此，不是制度而是天理才是最终的道德根据。在礼乐与制度发生分化的语境中（以及礼乐越来越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装点），理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试图恢复先秦礼乐的那种把实然与应然融为一体的道德评价方式，从而包含了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天理概念不仅是这一复杂的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而且也是理学体系自我瓦解的关键环节，因为恰恰是这一概念的出现最终预示了那种把道德评价与具体的背景条件融为一体的 worldview的最终瓦解。我把天理观的内在矛盾及其转化的动力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天理与求得天理的方法论之间的悖论。天理概念是贯穿宇宙论、形而上学和心性论的概念，但这几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部分。天理作为一种形而上学预设是非实证的，作为一种宇宙论预设是可知的，作为一种伦理秩序又必须是能够通过日常实践加以把握的。一方面，天理预设了通过具体的知识和修身实践而复归于自身的途径，从而构成了天理概念与带有实证性的格物致知论的关联。换言之，如果格物致知的修身实践逐渐地被理解为带有实证性的方法论，那么，它不仅会改变格物致知本身的含义，而且也会改变天理的含义，即把天理理解为一种客观的规律或事实，从而消解其形而上学的或价值论的含义。另一方面，天理预设了天与人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从而为道德实践提供了心性论的前提，这一前提

否定“理”是一种外在的客体，从而消解了格物致知作为一种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含义。如果“理”是遍在的，而不是外在的，那么，那种通过对事物进行分类并执着于这些分类的事实的“即物穷理”，就是对“理”的歪曲。我们看到的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格物致知作为抵达天理的途径与天理的形而上学性质开始发生冲突。在近代历史中，天理的形而上学特性是对带有实证色彩的即物穷理方法的否定，而实证方法又是对无法证实的天理的否定。

其次是天理与制度之间的悖论关系。天理作为一种超越性的概念包含着个体与天理之间的关联，即每一个人都可能通过日常的道德实践抵达天理，因而天理表达了一种超越具体权力关系和制度的力量和诉求；但是，天理概念内含的秩序观始终是以恢复礼乐的道德评价方式为内在的动力的，它力图在另一个层面建立道德与现实的统一关系，从而天理与秩序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天理与制度的悖论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天理概念把自己的依据建立在天道运行和主体的道德体认的基础之上，力图在道德评价上摆脱以等级身份（由科举制、官僚制、田制、税法以及过去遗留的贵族制）为依据的方式，从而产生了道德评价与制度的某种分离。这一分离意味着：以一套制度为客观性基础的道德形式面临瓦解的可能。关于制度与道德评价的关系，我稍后再作说明。其次，为了摆脱对天理的任意的和个人化的解释，理学家又强调分殊的“理”，即通过一理来确定万物的分位差别，从而再一次用天理为等级化的伦理提供正当化说明。无论是格物致知论中所包含的理的分类学，还是把理还原为每一个现实主体的良知，“理”都包含了一种内在的秩序观。概括地说，天理概念的超越性是对现实权力关系的否定，而天理与秩序的关系又是对其超越性的否定。前一方面可能导致天理的客观权威的丧失，后一方面又是对天理自身特性的否定。上述两个因素都是内在于天理概念及其运用过程内部的，并成为宋代至清代儒学争论和儒学形态转化的关键环节和动力。

先秦人格天概念中并不包含创世观念。作为一种最高主宰，天仍然依循某种形式的约束，这就是理序观念。因此，天本身虽然是一种最高主宰，

却并不是万物之标准。天与理的合一一是从主宰性的天过渡到天理观念的关键环节,这一转变使得“天理”或“理”成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标准和道德的起源,它大大扩展了天概念的内涵。从统治的合法性角度说,人格天及其对皇权的论证是直接明确的,而“理”概念则包含了某种程度的超越性和含混性。由于道德论证与天道观之间的关系的建立,道德判断的含义和意义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宋明理学各派的分歧亦即理学自身的危机都植根于道德论证与天道、天理之间的关系。牟宗三概括说:“自宋明儒观之,就道德论道德,其中心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或超越的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根据。”<sup>3</sup>但是,心性问题从来没有真正摆脱“天”的范畴,因而心性问题也不能脱离天理或天道问题加以单独的陈述。

理学世界观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天道论与道德论的内在关联。冯友兰曾把北宋道学的核心论题概括为“关于人的学问。它所讲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发展的前途和目的”。<sup>4</sup>牟宗三则直接把宋明理学归结为“性理之学”或“心性之学”,因为“宋明儒讲学之中点与重点唯是落在道德的本心与道德创造之性能(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天根据)上”。<sup>5</sup>但是,这一核心论题在初期道学中却遵循了一种天道论的叙述模式,即宋儒要从天道中直接引出人道,而不是从现实的秩序或个人在礼制秩序中的位置引出道德的法则。如果说孔孟由内达外,本于德而达于道,那么,北宋道学却大抵是由外转内,本于道而成其德。换言之,对于道学家而言,判断人的道德行为的标准是体现在自然本身之中的法则的标准,亦即宇宙秩序的标准。这一标准是普遍的,因而至少就原理而言,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与宇宙秩序达到同一的潜能。那么,如何才能确定天道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就成为北宋道学不得不着重讨论的问题:什么才是人、万物

<sup>3</sup>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卷,第7页。

<sup>4</sup> 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论宋明理学》,第37—38页。

<sup>5</sup>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卷,第3—4页。

和道德的起源？如何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天道论包含着对宇宙过程的描述，从而如何论证宇宙的自然运行与道德的关系就成为北宋道学的一个难题，这是因为：如果宇宙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的话，它如何能够同时体现道德的必然性？

初期道学的心性观和道德论建立在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框架之中，这也是天道和天理概念形成的前提。天道或天理既是宇宙的共同原理，也是宇宙的根源，它贯穿于万有之中，指导道德和伦理的实现。换言之，道德和价值渊源于宇宙的运行本身，从而道德的法则是在生生不息的天道运行中自行呈现的。这就是《易传》之“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宇宙论。周、邵、张在这方面大体相似，但具体路径则各有不同。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以解易的方式建立具有形而上学和宇宙论双重特征的体系：前者由“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归于人极的建立，后者则从天道论及道德心，再由道德心推广而言礼乐，开创了北宋道学合宇宙论、形而上学和道德论为一体的理论方式。这个“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生成变动的宇宙图景，而且还揭示出天道、地道、人道皆本一理的要旨。“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sup>6</sup>换言之，仁、义是天道运行的常理，也是圣人之德的根据。

与周敦颐相似，邵雍之学也带有图书派易学的特色。他的《皇极经世》与陈抟先天图之关系历来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邵雍精通象数之学，认为宇宙和历史的生成与展开全部可以用数来说明，与此同时，他的“先天气”视心为万物之源，更为直接地把道与心关联起来。他说：“先天气，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sup>7</sup>又云：“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sup>8</sup>，“天分而为地，地分而为万物，而道不可分也。其

<sup>6</sup> 周敦颐：《通书·顺化第十》，《周濂溪集》卷五，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7—98页。

<sup>7</sup>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本，1992年，第57页。

<sup>8</sup>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第17页。

终，则万物归地，地归天，天归道。”<sup>9</sup> 邵雍一方面提出“道为太极”的命题，另一方面又认为“心为太极”。<sup>10</sup> 万物惟心并不是说宇宙万物的最后质料为心，而是说自然中包含着人的理想。程颢评论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曰：‘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然未必有术……”<sup>11</sup> 邵雍之学一方面具有深刻的命定论色彩，另一方面又以心为太极、极重主体及其认知能力，但实际上道、太极、心与一乃是一物，故而人对物的认知不但不能局限于个体的经验，而且需要摆脱了人的地位来观物。这就是所谓“不我物，则能物物”。<sup>12</sup> 钱穆断言“康节乃以道家途径而走向儒家之终极目标者”，实为精彩的概括。他把邵雍的立场归结为“新人本位之客观主义”或“客观的唯心论”，认为这种要求在认知实践中否定个体经验、达到与天地合一的境界的方式，“能以心迹相融，把心的范围放宽了，把人的地位提高了，把主观与客观的界线也冲破了”，从而开了朱子“格物致知”的先河。<sup>13</sup>

张载之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sup>14</sup>，为关学之奠基。《西铭》论万物一体、理一分殊，核心在天

9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第 41 页。

10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第 48 页。

11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45 页。

12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第 49 页。

13 钱穆：《濂溪百源横渠之理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 5 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 年，第 60、63、4 页。

14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2724 页。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家们一般仍是重视礼制的，但在理论上却把道德论证与天道论关联起来。这反映了宋代社会的过渡性的特征。在贵族制瓦解的过程中，如何建立真正的道德谱系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含义。二程多次谈及“宗子法”，倡导巩固世家的谱系宗法，这微妙地显示了当时宗法衰颓的局面。张载也承认“宗子法”的必要性，但他似乎更重视的是“宗子法”的功能，而不是“宗子法”作为贵族传统世系的意义。在《经学理窟·宗法》中，他说：“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年，第 259 页。